

# 徽商：人才培养的催化剂

王世华 夏建圩

(安徽师范大学,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徽州历史上人才辈出,灿若星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明清时期由于徽商的崛起。徽商对人才的培养作用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重教兴学,奠定成才文化基础;二是以饶养学,确保成才多方需求;三是藏书刻书,提供成才丰富营养;四是惺惺相惜,帮助人才排忧解难;五是贾而好儒,刻苦自励力学成才。因此完全可以说,徽商是人才培养的催化剂。

**关键词:**徽州;徽商;人才

**中图分类号:** K248;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05X(2013)02-0083-08

**Huizhou Merchants: A Catalyst of Personnel Training**

WANG Shi-hua XIA Jian-wei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Abstract:** Huizhou region has cultivated people of talent in large numbers in history. There are a lot of reasons for this phenomenon. But,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 is the rise of Huizhou merchants. There are five aspects of Huizhou merchants' influence on personnel training. Firstly, Huizhou merchants focused on education and setting up schools, which established a solid basis for personnel training; secondly, they made good use of money to support education; thirdly, they collected and published books by block printing, which provided rich resources for personnel training; fourthly, they appreciated talented people, and got rid of worries and helped to overcome difficulties for them; fifthly, though they were merchants, they were fond of culture. They bore hardships and study hard, and tried to be talented. Therefore, we can say that Huizhou merchants were a catalyst of personnel training.

**Key words:** Huizhou; Huizhou merchant; talented people

千年徽州,人才辈出。尤其是明清六百年,徽州人才更是灿若星海,闪耀河汉;辉煌成就,各领风骚。他们当中既有造诣精深的名儒耆宿、政声卓著的干吏名臣、享誉四方的艺苑名流、学富五车的文坛才俊,也有颇多建树的科技群彦、身怀绝技的能工巧匠、富甲一方的商界巨贾,还有才华横溢的名媛闺秀、识见超凡的隐士名僧等等,可谓接芬错芳,数不胜数。一隅之地能够涌现如此众多的人才,这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在世界历史上也

可谓绝无仅有。

“问渠哪得清如许?”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样的千古奇观?一些学者已经敏锐地看到了这个现象并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叶尚志先生在谈到徽州人才时指出“社会经济发达的程度是人才涌现的基础和根本条件。但是仅仅有经济条件,还不足以产生人才。产生人才必须有文化条件、文化环境和社会教育措施形成的良好传统、风气作为中介,这是人才涌现的直接原因和每日每

时影响人的一生素质的无形的、无所不在的强大的能动因素。”<sup>①</sup>随后叶显恩教授也指出“精英人才的出现与成长,无疑是文化基因、道德动力、经济条件和社会结构等等因素,合力起作用的结果。在分析这些有利于滋生精英人才的因素时,固然要涉及徽州‘儒风独茂’的文化因素、显亲扬名的道德动力、徽商财雄势大的经济条件和各方面协调发展的社会结构,以及山明水秀的自然、人文环境的熏陶,但是大、小徽州间聚合和扩散的功能尤其值得注意。”<sup>②</sup>李琳琦教授曾专门分析了徽州进士之所以多的原因“优越的文化教育环境、雄厚的物质支持,使徽州的大姓宗族士子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可以一心向学,攀登科举高峰。这是明清徽州进士之所以大多集中于少数几个大姓之中的最重要的原因。”<sup>③</sup>郭志俊先生也提出类似的观点<sup>④</sup>。他们都共同注意到了徽州人才的出现是综合因素的结果,这是非常正确的。但限于篇幅,他们都未作深论。

综合因素的观点无疑是辩证的、全面的。但是辩证法不是均衡论,而是重点论,就是说在影响事物发展的诸多因素中必定有一个主要因素,在起着决定的作用。在研究徽州人才问题时,我们要看到,宋元时期,徽州固然出现了一些人才,但毕竟像晨星点点。而基本相同的人文环境、文化传统、社会结构,为什么到了明清时期,徽州人才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呢?那么明清时期的徽州和宋元时期相比,究竟有什么最大的不同呢?我以为就是徽商的崛起。所以,促进徽州人才辈出的各种因素中,徽商崛起是最主要的因素。本文拟就此做一些阐述,以就教于方家。

### 一、重教兴学 奠定成才文化基础

任何人才的成长都离不开坚实的文化基础,而文化基础的构筑又须臾离不开教育。虽然重教兴学在徽商崛起前就已是徽州的传统,但这一传统能否坚持并发扬光大,这就取决于经济基础。如果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这一传统恐怕只能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里得以坚持,大范围、长时期坚持并发扬光大恐怕就难了。正是徽商崛起后提供了足够的经济条件,发扬并光大了这一传统。“富而教不可缓也”<sup>⑤</sup>是徽商著名的理念。他们在经商过程中深知文化的重要性,尤其是将自己因为贫穷未能读书的遗憾,转变为对子弟读书的巨大期盼,使他们在致富后,以迫不及待的心情,不惜重金,延师课子。然后由己及人,推广到本族甚至本地区的其他子弟。

徽商重教兴学的表现,李琳琦教授在专著《徽州教育》中有系统而详细的论述,他指出:其一是亟置塾学;其二是广设义学;其三是捐修官学;其四是倡建书院<sup>⑥</sup>。

仅书院明清时期徽州先后就有 93 所<sup>⑦</sup>,“较他郡为多”<sup>⑧</sup>。从而为邑中的“俊秀者”提供了讲学会文之所及切磋制艺之地。正因为徽商如此重视教育,使他们的子弟从小就受到较好的基础教育,从而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必不可少的文化基础。徽人“十九在商”,而且徽商的这种行为,是普遍的现象、世世代代的行为,它所产生的巨大能量是难以估计的。徽州在历史上涌现出那么多的人才,如果没有基础教育的相对发达,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而这种相对发达的基础教育,离开徽商的支持,也是绝对不可能的。

重教兴学的传统深入人心,从而形成“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sup>⑨</sup>、“弦歌溢里巷,转毂遍四方”<sup>⑩</sup>的社会风气。读书,已成为徽州人的终极关怀。如果自己没能读书,一定要让子弟就学。江羲龄外出经商,其子江有容“弱冠相从旅邸,篝灯夜读。”同人对江羲龄说“君家徒四壁,今有子侗儁不群,正宜贸易,以苏涸鲋,徒咕啐诗书,非计。”而江羲龄却说“吾家中丞公、侍御公以来,世守一经,策名清时,苟不事诗书,而徒工货殖,非所以承先志也。”<sup>⑪</sup>这种思想在徽商中乃至徽州社会是非常普遍的。在传统的影响下,徽州妇女也都有较高的见识,歙县著名学者凌廷堪,“父文焯,业贾于海州。君生海州,六岁而孤,困苦穷巷中,母王氏鬻簪珥就塾师,粗记姓名而已。”长大后母亲让他经商,但他志不在此,“学贾不成”,一心向学。母亲在家庭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支

①叶尚志《徽学、徽州文化与徽州人才》,《人才开发》2000年第10期。

②叶显恩《谈徽州历史人物研究——〈千年徽州杰出历史人物〉序》,《黄山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1期。

③李琳琦《明清徽州进士数量、分布特点及其原因分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④郭志俊《明清徽州教育和人才培养》,《理论建设》2010年第2期。

⑤《歙县新馆鲍氏著存堂宗谱》卷2《柏庭鲍公传》,清刊本。

⑥李琳琦《徽州教育》第5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⑦李琳琦《徽州教育》,第61页。

⑧康熙《徽州府志·凡例》。

⑨光绪《婺源乡土志·婺源风俗》。

⑩(民国)吴吉祜《丰南志》第5册《明处士先兄汝钟吴公暨配孺人鲍氏状》。

⑪《歙县济阳江氏族谱》卷9《清故处士羲龄公传》,清道光刊本。

持他读书,“年二十余始复读书向学”,以后又支持他游扬州,拜江永、戴震为师,又到京师交游问学,乃大长进,终成进士。本可以授知县,他却投牒吏部,自改教职,“远利就冷官”。他就是利用教职空闲较多的条件,辛苦著述,成为一代经学大家<sup>①</sup>。王茂荫的成才也很曲折,他是徽商后代,祖父经商,年轻时病逝于羁旅。祖母才28岁,艰难蹉跎之中抚养孤子成人,谁知王茂荫出生不久,母亲又去世了,只能鞠养于祖母。祖母如母,为培养王茂荫,可谓呕心沥血。所以时人评价:王茂荫“学术风采著声中外,固其自致者,特殊抑亦先生笃摯之性,暨夫人(指茂荫祖母)坚苦之节有以培之也,是可表也已。”<sup>②</sup>

每个人成才的道路和方式是各不相同的,其中兴趣是非常重要的。父母若能尊重孩子的兴趣,让他自由发展,这对成才会有很大帮助。不少徽商在这方面表现出难得的开明。清代著名篆刻家歙县人巴慰祖的成才很说明问题。据黄左田《画友录》载:“慰祖……少读书无所不好,亦无所不能。弄藏法书名画、金石文字、钟鼎尊彝甚夥。工篆隶摹印,时伪作古器,脱手如数百年物,虽精鉴者莫能辨。”<sup>③</sup>汪中的《巴予籍传》记载:“予籍(慰祖字)故富家。”他的父亲是盐商,所以很富裕。虽然他“生而通敏”,但无意走科举之路,而对篆刻、收藏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少好刻印,务穷其学,旁及钟鼎款识、秦汉石刻,遂工隶书,劲险飞动,有建宁、延熹遗意。又益蒐古书画器用及琢研造墨,究极精美,罗列左右,入室粲然。”<sup>④</sup>父亲尽管对他的“不务正业”不以为然,甚至将他的藏室颜之曰“可惜”,但没有勒逼他非走入仕之路,而是尊重他的选择,他才得以“少好刻印,务穷其学”,终于成为著名的篆刻家<sup>⑤</sup>。戴震盘盘大才,一代儒宗。他的父亲戴弁是贩布的行商,是个小商人。戴震年10岁始能言,就傅读书,过目成诵,表现出过人的聪慧,而且孜孜向学。父母亲看到他是可造之才,没有让他继续做生意,而是支持他外出游学,拜师结友,戴震之所以能在各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乃至成为“前清学者第一人”(梁启超语),家庭的支持是一个重要因素。

## 二、以饶养学 确保成才多方需求

恩格斯说过:“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为基础的。”<sup>⑥</sup>同样,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的人才的成长,也是以经济为基础的。道理非常简单,任何人总得首先做到衣食无忧,他才能安心学习或从事精神生产,受冻挨饿去学习或创造,虽然能够坚持一时,但决不能持久。这一道理,古人也是很清楚的。明代徽州学者汪道昆就曾说过:“夫养者非贾不饶,学者非饶不给。”<sup>⑦</sup>要想生活,舍去生意是不会饶裕的;要想学习,没有饶裕的经济供给是不

行的。清人沈垚也说过:“非兄老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sup>⑧</sup>可见这基本上是个规律。孟子所说的“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话,也只是从磨练其意志方面着眼的,恐怕不能得出结论,只有“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才能成才。徽州固然不乏家中贫困而发愤成才的例子,但这决不是普遍现象。相反,我们只要查查徽州那些人才的“家底”,绝大多数父祖辈都是经商的,也有少数是做官的,无论是业贾还是为宦,可以说都是衣食不愁。这样,以饶养学,学子才能无后顾之忧,一心向学。

为什么学要“饶”养?因为学需师教,学需买书,学需交游,要满足此三者,非“饶”不可。

学需师教。无师自通是不可能的。教师的水平对学生成才的影响极其重要。而延师的费用是不低的,若是名师则更高。家“饶”就可以花重金聘请名师,教育效果自然不一样。如明代歙县盐商吴伯举致富后竭力培养儿子,“为之岁延师四人,其一讲德,其三修业。”故其子大有长进,“始冠,业已倾江都诸生。”<sup>⑨</sup>有这样好的教师,加上自己的努力,想必以后定能成才。徽商子弟汪莲府,咸丰年间进士,据俞樾回忆:“君家为休宁望族,号素封,以贵雄于乡十数世矣。自咸丰以来,始以文学起家,举孝廉者四人,成进士者二人,入词林者一人。”莲府少年时,父亲聘请俞樾祖父家教授,大有长进<sup>⑩</sup>。

学需买书。有了各种必须的书籍,学习起来才能得心应手。清代考据大师俞正燮的成才就得力于家庭的

①(清)阮元《研经室二集》卷4《次仲凌君传》,第110页,四部丛刊景清道光本。

②(清)何绍基《东洲草堂文钞》卷16《碑志·赠资政大夫王公墓表》,清光绪刻本。

③(清)王鏊《扬州画苑录》卷3,清光绪十一年刻本。

④(清)汪中《述学》别录,四部丛刊景无锡孙氏藏本。

⑤参阅王世华《徽商收藏的文化意义》,《安徽师大学报》2011年第5期。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20页。

⑦(明)汪道昆《太函集》卷50《明故礼部儒士孙长君墓志铭》,黄山书社2004年版。

⑧(清)沈垚《落帆楼文集》卷24《别集·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民国吴兴丛书本。

⑨(明)汪道昆《太函集》卷15《赠吴伯举序》。

⑩(清)俞樾《春在堂杂文》卷2《汪莲府兵部六十寿序》,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春在堂全书本。

图书。他父亲俞献以拔贡任句容县训导,正燮“随父之官。时方冠,侍养外惟以读书为事。父献学俸所入,尽给为买书费。积轴万卷,过目成诵。”<sup>①</sup>这样的条件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学问根柢。26 岁时父亲去世,但其兄正馥服贾江西以养母,正燮由于学问已有根柢,又无后顾之忧,才能外出谒师,以后又入幕校书,授徒讲学,终成一代大学者。汪煜是徽州盐商后代,父亲汪赓是顺治年间进士,自己则“初席丰饶,以锐志学业”,“家多藏书,披摘无遗义。”康熙年间终登贤书<sup>②</sup>。著名学者姚际恒,“歙人。居仁和,为商籍庠生。著《古今伪书考》,为近人所称。”他是徽商后代,家“富收藏,著《好古堂书目》。”<sup>③</sup>正是有这样的条件,他才能爬梳剔抉,考辨出大量的伪书。同治初年的进士汪鸣銮,同、光两朝重臣,“凡视学者四,典试者三,近世词臣无伦比。”原籍休宁,先世以盐筴起家。他“幼有夙慧,七岁即能通小篆。外王父履卿先生为桂岭尚书之介弟,富于藏弃,宝铁斋中金石图书充牣。韩太夫人(鸣銮母亲)携之归,靡不浏览,始有志于晁、陈、欧、赵之学。”<sup>④</sup>显然他的成才也得益于外祖父家的丰富藏书。

学需交游。《礼记·学记》有言“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欲成大器者一定要交友切磋,访学拜师,才能增长见识,不断提高。徽商家“饶”,就能提供经济支持。明代歙人富商子弟谢少连,“少年于书无所不窥,尤攻于史。千古之上,六合之外,如指诸掌。”先肄业紫阳书院,后又参加汪道昆的丰干社,与诸子问学辨难,因数蹶科场,乃绝意仕进。由于家中饶裕,乃出游金陵,纳交四方缙绅学士,以后“游道日广,远者千里,久者经岁。”与各地名士学者交流,学问大进。所著《闰典》、《酒史》、《花乘》、《品藻》、《开黄稿》、《定唐书》诸书,海内脍炙人口,而《季汉书》尤盛传诸台史,被认为是个难得的人才。连明代大学者李维桢也说“少连《季汉》、《定唐》,其词其事沿旧,其义则新,是非不谬于圣人,他著作亦称是。文史兼才,在吾党中寡矣。”<sup>⑤</sup>又如,“《皖雅》引蒋星岩云:新安程氏多诗人,侨居淮扬,有专集行世者指不胜屈。”<sup>⑥</sup>可谓人才济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程氏盐商特富,常常诚邀各地名流光临,或讲学或切磋,程氏子弟就可获得交友拜师的极好机会。时人谓:“(程)嗣立,……乾隆初,举鸿博。工诗文,精书法。尝买张氏曲江楼,构园其侧,名曰柳衣。集部中诸文士,讲学楼中。延桐城方舟、金坛王汝骥、长洲沈德潜诸耆宿为之师,极一时切磨之盛,邑人到今艳之。”<sup>⑦</sup>在这样的氛围里,既有名师可拜,又有名士交流,可谓“日边红杏倚云栽”程氏人才之盛也就不奇怪了。汪廷榜的成长经历也颇能说明问题。他 17 岁时,父亲让他经商,可是居闾闾半载,他实在无法适应这种环境,于是跪请父亲

允许自己改行业儒,开明的父亲虽然也是商人,但慨然应允。廷榜“遂锐志潜修,冥心研览,历寒暑无间。每岁暮,自外塾归,键户坐室中,一灯荧荧,吟咏伊吾,至鸡声喔喔相杂不少辍。”后肄业郡紫阳书院,院长赵星阁独加契重,延誉四方。并对他说“吾子好学深思,必久与高明者处,乃得相资以有成。今江宁钟山书院,江左英杰之士多在焉,子盍往游以张其学识乎?”于是廷榜听从先生告诫,“乃担簦负笈徒步至金陵,既就馆,与金坛王景福、上元董敏修、戴燕诒、亳州梁闻山、宣城梅二如、江宁侯起叔诸君子为文会,切磋江左者垂十八年,于是所学大进,而文誉亦日隆。”<sup>⑧</sup>乾隆辛卯,以经魁举于乡。可想而知,18 年访学,如果没有相当的经济基础来支撑,那是不可想象的。后来他虽五试于礼闈不第,但先后任江西饶州芝阳书院山长和旌德县训导,培养了众多士子,成了一位著名教育家。明代潘之恒之所以能成为著名的戏曲艺术家和诗人也是得力于家“饶”。他年轻时“身游太学,以文章意气取重于时。”他又钟情戏曲,酷爱交游。“游燕赵、齐鲁、楚越、金陵、广陵,数岁不归。”与戏曲家张凤翼、汤显祖、沈璟、屠隆以及袁宏道兄弟等的友谊很深,曾多次主持“曲讌”活动。在这种交游中,他的艺术才华不断提升,著成《巨史》、《鸾啸小品》和诗集《涉江集》。他之所以能够如此,就因为“父与世父、叔父诸昆弟子姓素封数十人。”<sup>⑨</sup>没有如此富裕的经济条件

①《皇清教授文林郎己故举人拣选知县俞公崇祀乡贤事实十八条》,俞正燮《癸巳存稿》,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②(清)延丰《重修两浙盐法志》卷 25《商籍二·人物》,第 578 页,清同治刻本。

③(近)许承尧《歙事闲谭》卷 5《姚立方为歙人》,黄山书社 2001 年版。

④(清)叶昌炽《奇觚廋文集》卷下,第 69—71 页,民国十年刻本。

⑤(明)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 70《谢少连家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 152,第 216—218 页。

⑥(近)许承尧《歙事闲谭》卷 8《续录程氏诸人诗》。

⑦(清)王覲宸《淮安河下志》卷 13《流寓》,第 518 页,《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辑(16)》,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

⑧嘉庆《黟县志》卷 15《艺文志·国朝文》,第 518—520 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56)》,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

⑨(明)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 43《吴孺人寿序》,第 413—414 页。

支撑,他恐怕就要为“稻粱谋”而寸步难行,更遑论什么艺术家了。

为了保证以“饶”养学,徽商一般都采取贾儒相济的策略。如有数子,必然因材施教,作出或儒或贾的安排,“贾为厚利,儒为名高。”以贾养儒,以儒护贾,左提右挈,互为奥援。明代歙商江才四十几岁时就把商业交给长子江琇、次子江珮打理,自己归乡一心培养三子江瑾、四子江珍,果然不负所望,江珍后来成了进士<sup>①</sup>。明歙商金赦以服贾起家,积二十年,业大起。“于是遣二子入太学”,金赦去世后,夫人持家秉,“呼二子前,命长子曰:‘茂,尔当室,第卒业子舍中。’命次子曰:‘芝,尔摄贾而儒,毋坠世业。’”<sup>②</sup>长子从贾,次子归儒。吴义庄说得更清楚,他以经商大饶,临终前召四子留下遗言“而翁从此西矣。大继当室,大纯佐之;大缙业已游成均,治经术,大绅从之。四人者左提右挈,以亢而宗,而翁瞑矣。”<sup>③</sup>可以说绝大多数徽商都是这样安排的,既保证了商业能够继续发展,又使儒业得有经济支持、后继有人,大批的人才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

### 三、藏书刻书,提供成才丰富营养

人才的成长当然须臾离不开图书,它是人才成长必不可少的营养。可以说在这方面徽商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才培养的需要。

首先,徽商大量地藏书。“贾而好儒”是徽商的鲜明特点,他们致富后,一则为了满足自己读书的需要,二则为了培养子弟的需要,一般都大量购书、藏书,这在徽商中已形成风气。时人曾说道“明末流寇之乱,徽地以僻处山中,独获完善,休养生息,至乾隆朝,故徽属最称殷富。维时族之人,多务商业,以豪侈相尚。虽未知为学之道,而故家大户,藏书颇富。”<sup>④</sup>这当然不只是清代也不只是某个宗族如此,可以说这是明清时期整个徽商的情形。如清初婺源洪庭梅,“偕姻戚权木值于闽越楚蜀数千里外”是个大木商,“藏书千余卷,视子之明敏者,严加督课,循规蹈矩,罔或陨越。”<sup>⑤</sup>婺源程黻,“以贸迁往来苏、宁间”较为富有,但他“自奉俭约,案无重味,櫛无新衣,屏珠玉,玩好弗蓄,藏书甚富。”<sup>⑥</sup>徽商子弟吴蔚光,进士及第后,“爱书籍及法书、名画,藏书以万卷计。”<sup>⑦</sup>黟县商人李尚吉,“少好学,善事父母,以鲜兄弟,承父业,弃儒就贾。暇则读书,藏书数千卷。”<sup>⑧</sup>黟县大商人李宗熿家也是“藏书颇富”。徽商子弟程山尊,家“有园一区,藏书万余卷。”<sup>⑨</sup>徽商藏书,确是普遍现象。这些图书无疑给人才成长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正因为徽商爱藏书,所以他们当中出了不少藏书家。马曰琯、马曰璐兄弟以及程晋芳、汪氏振绮堂就是代表。马曰琯、马曰璐兄弟是扬州盐商,人称“二马”。

在他们的小玲珑山馆中辟有“丛书楼”,他们酷爱藏书,“有希见者不惜千金购之,玲珑山馆中四部略备,与天一阁传是楼诸家若相等也。”<sup>⑩</sup>著名学者全祖望指出“吾友马氏嶰谷(曰琯)、半查(曰璐)兄弟横厉其间,其居之南有小玲珑山馆,园亭明瑟而岿然高出者丛书楼也,进叠十万余卷……百年以来海内聚书之有名者,昆山徐氏、新城王氏、秀水朱氏其尤也,今以马氏昆弟所有几几过之。”<sup>⑪</sup>可见是一位大藏书家。扬州盐商程晋芳也是藏书家,他曾回忆道“余年十三四岁即好求异书,家所故藏凡五千六百余卷,有室在东偏,上下小楼六间,庭前杂栽桂树,名之曰桂窟。四方文士来者,觞咏其中,得一书则置楼中题识装潢,怡然得意。吾友秀水李情田知余所好,往往自其乡挟善本来,且购且钞,积三十年而有书三万余卷。……自来京师十年,坊肆间遇有异书,辄典衣以购。”<sup>⑫</sup>为了藏书,简直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乾隆进士汪慧,祖籍黟县宏村,是典商的后代,其父汪光豫始卜居浙江荐桥之馆驿,汪光豫的堂名为振绮堂。他家就是“世以藏书为事,至鱼亭公(汪慧)益加搜罗,于是‘振绮堂藏书’之名始著。”“当时藏书家浙东称范氏天一阁,浙西称汪氏振绮堂,此外又有吴氏瓶花斋、赵氏小山堂”<sup>⑬</sup>。盐商鲍廷博也是藏书家,他定居桐乡青镇(今乌

①《歙县溪南江氏族谱·明赠承德郎南京兵部车驾司署员外郎主事终慕江公墓表》,明隆庆刊本。

②(明)汪道昆《太函集》卷52《海阳处士金仲翁配戴氏合葬墓志铭》。

③(明)汪道昆《太函集》卷56《吴田义庄吴次公墓志铭》。

④(清)戴琴泉《戴东原先生轶事》,第4352页,《续修四库全书》集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⑤《婺源焮煌洪氏通宗谱》卷58《清华雪斋公传》。

⑥(清)冯桂芬《显志堂稿》卷6,第129—130页,清光绪二年冯氏校庐刻本。

⑦光绪《常昭合志稿》卷22《人物志·耆旧》,第430—43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⑧民国《黟县四志》卷14《杂志·文录·李希甫先生传》,第309页。

⑨(清)施闰章《学余堂集》文集卷7《诗文集序》,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⑩(清)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30,清乾隆二十五年教忠堂刻本。

⑪(清)全祖望《鮑琦亭集外编》卷17《丛书楼记》,清嘉庆十六年刻本。

⑫(清)程晋芳《勉行堂文集》卷2,清嘉庆二十五年冀兰泰吴鸣捷刻本。

⑬《汪穉卿先生传记》卷1,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辑,第29—39页,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

镇)杨树湾,建有“知不足斋”书屋。他勤学好古,不求仕进,喜购藏秘籍,所收甚富。时人评价他说“君收储特富,鉴裁甚精,壮岁多获两浙故藏书家旧物,偶闻他处有奇文秘籍,或不能得,则勤勤假钞,厥副,数十年无懈倦。”<sup>①</sup>更让人惊奇的是,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征集天下遗书,江浙两省藏书家呈献者种数尤多,而最多者四家:浙江之鲍士恭(鲍廷博之子)、范懋柱、汪启淑、两淮之马裕(马曰瑄之子)四家,除了范懋柱之外,竟然都是徽商或徽商后代。这起码说明两点:一是徽商的确酷爱图书并且藏书丰富;二是徽商对人才的培养具有高度热忱。他们深知献出孤本善本图书采入《四库全书》,就能使更多的士子受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行动。

再多的藏书如果束之高阁、藏之深闺,不被利用,那也仅是文物,对人才培养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徽商不是这样,他们是开放式藏书,允许士人前来阅读研究。这一点后面将有论述,此不赘。

其次,徽商不仅藏书,还大量刻书。徽州书商所刻书籍早在明代就闻名天下。明中期学者胡应麟曾指出:“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sup>②</sup>可知歙县的书商所刻之书已经能与苏州、常州所刻书籍媲美了。明人谢肇淛也说“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刻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板。”<sup>③</sup>明代中后期,正是徽商发展到繁荣阶段,推动了文化的大发展,大批徽州人奋志芸窗,搏击科场,需要大量的图书。徽州书商的大量刻书,正是适应了人才培养的需求。到了清代,徽州书商继续发展,并把刻书事业拓展到长三角一带。尤其要指出的是,在清代,一些徽州盐商也出于对文化事业的热爱和对人才培养的重视,开始刻书。最典型的就是“二马”和鲍廷博。

马曰瑄、马曰璐兄弟既是藏书家,也是刻书家。他们不惜千金为大学者朱彝尊刻《经义考》,为蒋衡装潢所写《十三经》,又刻《许氏说文》、《玉篇》、《广韵》、《字鉴》等书,让它们广泛传播。二马刻书的目的不在谋利,而在传播文化,所以他们所刻之书,校讎精、质量高,被士人称为“马板”,深受士人欢迎。鲍廷博更了不起,家有“知不足”藏书斋,立志精选善本刊刻《知不足斋丛书》,几十年如一日,一直连续刊刻 26 集,自己已 86 岁高龄。翌年辞世后,其子士恭又刻了二十七、二十八两集也辞世,廷博孙直言再续刻二十九、三十两集。《知不足斋丛书》问世后,不仅受到皇帝的嘉赏,更受到广大士子的热烈欢迎。时人如此评述“歙县鲍涑钦廷博辑刻《知不足斋》丛书,久为艺林推重,约而言之,盖有数善:全书三十集,都二百余种,搜罗之富,实罕其比;所辑各种,或旧刻脱讹而此独完好,或中土久佚而传自海外;无

陈陈相因之弊,且皆学者必需之书,采辑之善,允推独步。”<sup>④</sup>可以说徽商刻书,嘉惠士林,功德无量,为人才培养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 四、惺惺相惜,帮助人才排忧解难

人是千差万别的,人才成长的道路也是迥然相异的。有的人左右逢源,“天上碧桃和露种”,有的人却命途多舛,“芙蓉生在秋江上”;有的人一举成功,“春风得意马蹄疾”,有的人却屡试不第,“泪滴东风避杏花”。对于命运不济甚至穷困潦倒之人,只要堪可造就,徽商都会怀着惺惺相惜的心情,给予无偿的援助。有时正是这种援助,玉成了一位人才。

一是经济上的帮助。这是最普遍的做法。例如明代歙县商人黄铸在淮阴经营盐业致富,好贤礼士,挥金不靳。宗谱记载“淮阴当南北日冲之地,士大夫毂击之区,君延纳馆餐,投辖馈遗。而尤注意计偕,寒素者赖君踊跃穷途,飞翼天衢。”<sup>⑤</sup>计偕,就是指赴京会试的举人。古人云“长安居,大不易。”更何况考试了,食、住、行、考、拜师、会友,在在需钱,有些寒素的举人往往因此而放弃会试。黄铸对这些人总是慷慨解囊,使他们“踊跃穷途,飞翼天衢。”千万不要小看这种经济帮助,有时竟能彻底改变人才的命运。如婺源商人朱日丰,“少时贾于嘉兴二十余稔,积货至三百余万。有子六人,命长子与四、五子居婺源,二、三子与六子居嘉兴。”乾隆十年,朱日丰回婺源展墓,至家塾见到塾师,知其为孝廉,就问他为什么不去参加会试,“塾师以贫对。问需几何,曰:‘非百金不可。’明日,如数赆之,塾师欣然就道,即于是科大魁天下,盖常州钱文敏公维城也。”<sup>⑥</sup>一名落魄的举人,在徽商朱日丰的资助下,竟然中了当年状元,钱维城后来不仅官至刑部侍郎,而且成为著名画家,供奉内廷,被尊为画苑领袖。像这类例子很多,充分反映了徽商对人才的呵护。

①(清)顾广圻《思适斋集》卷 12《知不足斋丛书》序,清道光二十九年徐渭仁刻本。

②(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四,明万历刻本。

③(明)谢肇淛《五杂俎》卷 13,明万历四十四年潘膺社如韦馆刻本。

④(清)鲍廷博辑、鲍祖志续辑《知不足斋丛书》,民国十年上海《古书流通处启》,据清鲍氏刊本景印。

⑤《歙县球塘黄氏宗谱》卷 5《节斋黄君行状》,明嘉靖四十一年刊本。

⑥(清)方浚颐《二知轩文存》卷 29《嘉兴朱氏度垣、颖艘两先生合传》,清光绪四年刻本。

二是为人才的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前述扬州马曰琯、马曰璐兄弟家中藏有大量图书,这些图书并非“藏在深闺人不识”,而是欢迎各地士人前来阅读、研究,并且提供优越的物质条件。多少士人学者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日日夜夜,成就了自己的事业。如厉鹗“性情孤峭,义不苟合,读书搜奇爱博,钩新摘异,尤熟于宋元以来丛书稗说。”以孝廉再试礼部,不第。乾隆元年,举鸿博,因误写报罢。继而以孝廉可选县令,将入京,被朋友留之觞咏数月,遂不就选而归。在这种落魄时候,马氏兄弟看中了他的才华,将其“延为上客”,一住就是几年,让他潜心研究。“马氏小玲珑山馆多藏旧书善本,间以古器名画,因得端居探讨。”<sup>①</sup>在这里厉鹗完成了煌煌巨著《宋诗纪事》100卷,以及《南宋画院录》、《辽史拾遗》、《东城杂记》等书,皆博洽详赡。当然,除了厉鹗,还有不少士子都得益于二马,时人谓“其园亭曰小玲珑山馆、曰街南老屋,四方名士过邗上者,觞咏无虚日。时卢雅雨都转提唱风雅,全谢山、符幼鲁、陈楞山、厉樊榭、金寿门、陶篁村、陈授衣诸君来游,皆主马氏,结邗江吟社,与昔之圭塘玉山埒。”<sup>②</sup>这里所说的圭塘玉山,是指元末昆山顾阿瑛,才性高旷,风流豪赏,曾建“玉山草堂”,作为四方文人雅集的场所,被称为“玉山雅集”。二马也是如此,众多文人雅士结邗江吟社,经常在小玲珑山馆聚会,切磋学问,赋诗联句,留下了多少脍炙人口的诗篇。二马给他们的帮助,令文人学者非常感动。在马曰琯逝世后,著名诗人袁枚将他比作元末的顾阿瑛,深情地写下这样的诗什“山馆玲珑水石清,邗江此处最知名。横陈图史常千架,供养文人过一生。客散兰亭碑尚在,草荒金谷鸟空鸣。我来难忍风前泪,曾识当年顾阿瑛。”<sup>③</sup>学者楼铸也在小玲珑山馆研读多日,受到百般照顾,所以他在《题丛书楼呈马嶰谷半查昆季两先生》一诗中非常感激地写道“阅肆愧非才,插架困贫乏。感兹故人意,借抄兼借榻。”<sup>④</sup>穷厄以终但颇有学问的寒士姚世钰也是丛书楼里的座上客。他曾满怀深情地写道“薄游扬州,马秋玉、佩兮兄弟为余置榻丛书楼下,膏馥所沾巧(溉)药物所扶持,不知身之在客也。”<sup>⑤</sup>他在丛书楼里读书、校书,获益良多,最终成为一位著名学者。从中就可看出二马对人才的惺惺相惜之情。

三是为人才排忧解难。著名学者朱彝尊《经义考》的问世,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朱彝尊写了一部《经义考》300卷,陆续付梓,书稿“校刻迨半,鸿业未终”,却赍志以殁。雍正年间,马曰琯从朱彝尊孙子处获得书稿,深知此书的宝贵价值,欣然邀约同志,拟刻完此书。“中有所格,不果。”过了20年,德州卢公重掌江南鹾政,将此事又嘱托给马曰琯。于是马氏兄弟利用家中丰富的藏书,“偕钱塘陈君授衣、仪征江君宾谷、元和惠君定宇、华

亭沈君学子相为参校”,费时一年,剞劂乃竣,计130多卷,合前所刻167卷,终成完书<sup>⑥</sup>。马氏兄弟商略考订,兼综其事,不知投入了多少精力和财力。这部煌煌巨著的问世,不仅可以告慰朱彝尊于九泉,更是为我国传统文化宝库增添了新的瑰宝。

马氏兄弟不仅为一些学者刻书,而且为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考虑得相当周到。所谓“若夫倾接文儒,善交久敬,意所未达,辄逆探以适其欲。”如钱塘范镇、长洲楼铸,皆为名诸生,年长未婚,马曰琯爱才心切,竟然为他们择配以完家室。钱塘厉鹗,六十无子,马曰琯又专门为他纳妾,还腾出房屋给他们居住,所谓“割宅以蓄华妍”。勾甬全祖望,不幸患了重病,为了尽快地治好他的疾病,马曰琯竟然悬赏,以激励医生用心诊治。天门唐太史,客死维扬,又是马曰琯拿出重金归其丧。勾吴陆锡畴生病而且很严重,马曰琯得知后买舟疾趋前来探望,陆锡畴感动地说“只有你能为我治理丧事啊。”至于一些好朋友去世后,每年周恤他们妻子儿女的事就更多了<sup>⑦</sup>。可以说对人才的关怀真是百般呵护,无微不至。

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程晋芳与吴敬梓的交往。吴敬梓与程晋芳的族祖程廷祚是至交,因而也结识了程晋芳。乾隆六年(1741),当24岁的程晋芳与41岁的吴敬梓初次见面,非常投契,立即结为忘年之交。据史载,两人曾有四次会面,或研究学问,或同游揽胜,或赠答唱和,坐谈古今。此时的吴敬梓时运不济,命途多舛,虽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却穷愁潦倒。受晋芳的盛情邀请,吴敬梓在乾隆六年(1741)来到淮安程晋芳的府第,一住就是3个月,晋芳当然给了他不少资助。过了几年吴敬梓又去了淮安。乾隆十七年(1752)春,程晋芳来南京应试,期间他与吴敬梓等友人聚首畅游,相互酬唱。乾隆十九年(1754)十月初,吴敬梓客居扬州期间程晋芳自

①(清)王昶《湖海诗传》卷2,第11—12页,清嘉庆刻本。

②(清)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41,第825页,清同治刻本。

③(清)袁枚著、周本淳标校《小仓山房诗文集·诗集》卷2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87页。

④(清)楼铸《于湘遗稿》卷1,第2页,清乾隆二十年陈章刻本。

⑤(清)姚世钰《屏守斋遗稿》卷2。

⑥(清)朱彝尊《经义考》目录卷下《后序》,中华书局1988年版。

⑦(清)杭世骏《道古堂全集·文集》卷43《墓志铭·朝议大夫候补主事加二级马君墓志铭》,第347—348页,清乾隆四十一年刻,光绪十四年汪曾唯修本。

淮来扬,两人意外相逢。这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时过境迁,晋芳此时也债台高筑,穷困难支。吴敬梓执之手泣曰“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处也。奈何!”此次见面后 20 多天,吴敬梓就溘然长逝。在吴敬梓去世后,程晋芳为其撰写了迄今最为详尽的也是唯一的一篇传记《文木先生传》,从而保存了许多关于吴敬梓的珍贵史料。他还出资将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刻印出版,使这部伟大的讽刺小说得以传世。

### 五、贾而好儒,刻苦自励力学成才

以当今人才观视之,徽商中可谓人才济济。他们审天时,趋地利,察物情,知人善任,运筹帷幄,在众多的竞争者中能够脱颖而出,富甲一方。其中商界奇才,数不胜数。更难能可贵的是,很多徽商竟然成为文化人才,在文化上做出重要贡献,这真是其他商帮所罕见的。贾而好儒,对文化知识的渴望,是徽商坚持学习的不竭动力。起初只是一种爱好,一种习惯,久而久之,就升华为一种对学问的追求,浑然不觉中成为人才。事实正是如此。如汪中,“其先歙人,后迁扬州,遂占江都籍。少孤,性至孝,奉母以居,天资高迈,好曼骂,人多忌而恶之。为诸生十余年,屡试于乡不售。”他“家贫善治生,衣食渐充裕。巡盐御史闻其名,使司文汇阁所颁之四库书。”虽然他屡试不售,但经商之余却好学不辍。“君读书极博,六经子史以及医药种树之书,靡不观览。著书率未成,少日作诗古文复自弃去。今所存者有《述学》四卷,皆杂文也。”<sup>①</sup>梁启超甚至认为:清代骈文,“其实极工者仅一汪中”<sup>②</sup>,不能不说他是个人才。

婺源商人董邦直,兄弟五人,俱业儒,“食指日繁,奉父命就商。”但他贾而好儒,“奔走之余,仍理旧业,出必携书盈筐,……稍暇,手一编不撤。喜歌诗,兼工词,著有《停舸诗集》四卷、《小频伽词集》三卷”唐县令和御史徐雨芹分别赠以“才优学贍”、“艺苑清芬”的匾额<sup>③</sup>。董邦直虽然没有什么功名,但我们完全可以说他是个人才。当然他是通过自学成才的。

歙商黄蛟蜂,幼颖悟,善记诵,童时从父贾宣州,表现出善贾的才能。婚后愤怒于里胥催租的凌厉辞色,发奋曰“予岂不能为士以免役哉!”即下帷数月,诵制举义,明年补邑弟子员。虽然他以后并没有考中举人、进士,并且继续经商,但他对学问的热爱程度丝毫不减,一生著述有《读易抄》3 卷、《尚书备忘》12 卷、《春秋传略》2 卷、《四书备忘》14 卷、《性理便览》18 卷、《史鉴会要》64 卷、《通鉴外纪》5 卷、《蛟峰文集》4 卷,时人评价说这些著作“皆经世实学,非剽窃恒订者比。使先生遇合于时,树立岂可量哉!”<sup>④</sup>著述如此丰富,你能否认他是个人才吗?

人才吗?

商人自学成才的典型恐怕要数明代休宁商人程大位和清代扬州二马和程晋芳了。程大位“幼而慧,学为儒业,既通,不复出试吏,而为儒不被废。耽坟籍,斗文字,而尤长于算数。年既壮,周游吴楚之墟。”<sup>⑤</sup>程大位自己也说“予幼耽习是学,弱冠商游吴楚,遍访名师,绎其文义,审其成法,归而覃思于率水之上。”<sup>⑥</sup>他由于经商需要,对珠算进行改进,经过多少年的探索,终于完成名著《直指算法统宗》,成为驰名中外的数学家。

马氏兄弟虽为盐商,但“好学博古,考校文艺,评隲史传,旁逮金石文字。”<sup>⑦</sup>他们尤其好诗,时人评价马曰琯“诗骨清峻,闭户湛思,辄压侪偶。”<sup>⑧</sup>他著有《沙河逸老集》6 卷、《嶰谷词》1 卷、文集若干卷,马曰璐著有《南斋集》。他们可谓难得的文化商人。

程晋芳,自高祖时由歙县迁到扬州,经营盐业并从此发家致富。他的父亲程迁益继续业盐并入籍江都。父亲去世后,将偌大的家业传给了晋芳。如果晋芳一心归商,可能会在原有的基础上更上一个台阶,成为更大的富商。然而程晋芳偏偏惜情好儒,潜心向学。他利用家中丰富的藏书,徜徉在书海中。“君性嗜学,见长几阔案辄心开,展卷其上,百事不理。”<sup>⑨</sup>他覃研典籍,虚怀求益,故博闻宏览,而才情丰蔚。大学者袁枚评价他说:“君学无所不窥,经史子集,天星地志,虫鱼考据,俱宣究而尤长于诗,古文醇洁,有欧、曾遗意。”<sup>⑩</sup>袁枚对程晋芳的诗最为推崇,曾有诗赞之曰“平生绝”(下转第 95 页)

①(清)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 35《汪容甫墓志铭》,第 213—214 页,清嘉庆十八年刻本。

②(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三十一《前清学风与欧洲文艺复兴的异点》,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

③光绪《婺源县志》卷 29《人物·孝友》。

④《歙县潭渡黄氏族谱》卷 9《蛟峰先生传》。

⑤《算法统宗·序》,转引自张秉伦、胡化凯《徽州科技》,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6 页。

⑥《书〈直指算法统宗〉后》,转引自张秉伦、胡化凯《徽州科技》,第 46 页。

⑦(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 4,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86—89 页。

⑧(清)杭世骏《道古堂全集·文集》卷 43《墓志铭·朝议大夫候补主事加二级马君墓志铭》,第 347—348 页。

⑨(清)李元度辑《国朝先正事略》卷 43,清同治刻本。

⑩(清)袁枚著、周本淳标校《小仓山房诗文集·文集》卷 26。



竟孤独!天无日,地无光,不知我郎在何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无声,如今你撒手归西去,叫我靠落何人度时光?日如年,夜如年,披麻戴孝真可怜。低头化纸钱,抬头见坟莹,纸灰化成飞蝴蝶,血泪染成红杜鹃。”叱咤一时的徽州商帮除了是一部艰苦奋斗史外,对有些家庭来说,又是一部极为心酸的徽商爱情悲剧史,还是一部徽商妇臣服于封建礼教的苦难史。

民谣是一种民间社会音乐,浸润着一种民间艺术的美。那么民谣的艺术美,美在何处呢?笔者认为形象性是民谣艺术美的一般表征,以情动人,是民谣艺术美的显著特点,独创性是民谣艺术美的重要标志。通过搜集的徽州民谣,我们不难发现,很多民谣这三点都有所涵涉。如在绩溪民谣“写封信啊上徽州”中,“青竹叶,青纠纠,写封信啊上徽州,叫爷不要急,叫娘不要愁,儿在苏州做火头,一日三餐锅巴饭,一餐两个咸鱼头。儿的那双手像乌鸡爪,儿的那双脚像炭柴头。天啊地啊,老子娘啊,儿在外面吃苦头。”这其中的乌鸡爪和炭柴头,就很富有形象性,生动形象地体现出了儿子生活的艰苦和劳累,也反映出了情感上的特殊含义,是认识和情感形态的融合。徽州人民根据社会现实创造出了民谣,而民谣又反

映了社会现实,徽州民谣具有丰富的主体创作自觉性和社会性,每首民谣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独创的美,一种不可重复、独一无二的民间社会的艺术符号。

总之,徽州民谣曲折反映着徽州商人的商业生活习俗和由此衍生的社会现象,我们在搜集研究这些徽州民谣时,要学会发散性地探究民谣这一民间文化艺术,不仅仅是聆听民谣本身,还要由表及里地去探索民谣背后深层次的表达内容和隐含寓意,通过民谣来体悟徽州商人在商业生活习俗层面的具象图景和真实背景活动。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池州雉研究》(12BZW121)和安徽省重点学科“专门史”建设项目(19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何根海(1963-),男,安徽枞阳人,池州学院院长、历史与社会学系二级教授,皖南民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陈瑞

(上接第90页)学都探遍,第一诗功海样深。”<sup>①</sup>程晋芳不仅自己长年刻苦钻研,而且虚心求教。自到京师后又从大学者朱筠、戴震问学。他笃信程朱之学,时人评价他“综核百家,出入贯串于汉宋诸儒之说,未始不以程朱为职志也。”<sup>②</sup>他曾在《正学论》七篇中,反复讨论治学之道,可见他的治学宗旨。由于他的勤奋笃学,一生著述甚丰。计有《周易知止编》30余卷、《尚书今文释义》40卷、《尚书古文解略》6卷、《诗毛郑异同考》10卷、《春秋左传翼疏》32卷、《礼记集释》若干卷、《诸经答问》12卷、《群书题跋》6卷、《桂宦书目》2卷、《戴园诗集》10卷、《勉行堂诗集》24卷首一卷、《勉行堂文集》6卷、《勉行堂集》1卷等,真可谓著作等身,说他是大大学者绝不为过。

综上所述,徽商确是人才培养的催化剂。明清时期徽商的崛起,使徽州人才培养局面大为改观,其影响极其深远。梁启超在谈到清代学术时曾说“欲一国文化进展,必也社会对于学者有相当之敬礼;学者恃其学足以自养,无忧饥寒,然后能有余裕以从事于更深的研究,而学乃日新焉。近世欧洲学问多在此种环境之下培养出来,而前清乾嘉时代,则也庶几矣。”<sup>③</sup>乾嘉时代正是徽商对学者“借抄兼借榻”、“药物所扶持”的“有相当之敬礼”的时代,从而催生了大批人才的涌现,在推动清代

学术走向全盛时代的合力中,徽商的力量是不能低估的。正如梁启超在同篇所说“夫此类之人,则何与于学问?然固不能谓其于兹学之发达无助力,与南欧巨室豪贾之于文艺复兴,若合符契也。”梁氏是着眼于学术而言的,如果着眼于人才培养,我认为也应作如是观。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经济与文化互动视野下的徽商研究》(07BZS04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世华(1948-),男,安徽肥东人,安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夏建圩(1973-),男,安徽郎溪人,安徽师范大学博士生。

责任编辑:陈瑞

<sup>①</sup>(清)袁枚著、周本淳标校《小仓山房诗文集·诗集》卷27。

<sup>②</sup>(清)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14,第145—146页,清李彦章校刻本。

<sup>③</sup>(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十八《清学全盛的时代环境》。